

湖南作家作品研究·唐浩明专辑 主持人:湖南科技大学吴广平教授

[主持人语]唐浩明,原名邓云生,湖南衡阳人,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岳麓书社首席编辑,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编辑、学者。先后编辑出版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四位湖南近代名人的文集,创作“晚清士人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撰写“评点曾国藩”随笔系列著作七种。《曾国藩》被香港《亚洲周刊》列入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并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又被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推选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受欢迎的十本书之一,同时被列为中纪委网站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的56本书之一。《杨度》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张之洞》获第九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广受海内外华人的喜爱,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十多家出版社,以不同的版本形式出版他的作品,20多年来,长盛不衰。唐浩明先生系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其文学创作以湖湘近代士人人为中心,以曾国藩为焦点和重点,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厚重的底蕴,表现了中华民族悲怆的心路历程。评论界对他的历史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著名学者吴秀明教授的这段话可作为代表:“唐浩明的皇皇九大卷、洋洋三百多万言的三部小说在这方面似乎就更突出了。他的以文明、社会进步而不是以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为取向的人文立场,对知识分子和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批判,同时又将其纳入世界整体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理念,不仅极大地激活、提升了题材本身固有的厚重的史实内涵,而且使其笔下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观照性,并让我们由此及彼对古与今、中与外、情与理、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等关系问题,作出深刻的反省和别具新意的阐释。”(吴秀明:《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唐浩明专辑”,特邀请几位专家学者撰文,对《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和随笔《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进行深入探析,冀望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唐浩明先生文学创作的研究。

历史能动与宿命及其文化浮沉

——评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何桂芬,吴广平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塑造了一位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了一出历史宿命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其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则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关键词]唐浩明;《曾国藩》;时代悲剧;文化挽歌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1-0001-08

收稿日期:2015-12-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103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149)

作者简介:何桂芬(1990-),女,湖南双峰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吴广平(1962-),男,湖南汨罗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The Initiative and Destiny of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Review on Tang Haoming's Long Historical Novel *Zeng Guofan*

HE Guifen; WU Guang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n his long historical novel *Zeng Guofan*, Tang Haoming successfully created the image of a famous non-Confucianist and ruler dislocated by the times, a marvelous striving history of Zen Guofan, and a moving tragedy of the times mixed with historical destiny and times background. The description of Zen's struggling and historical changes aroused the bitter retrospection, deep investig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eyond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s.

Key words: Tang Haoming; *Zeng Guofan*; tragedy of the times; elegy of culture

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将主人公置身于封建社会末期这一大文化背景之下,由此,曾国藩就绝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角色活跃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他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引领人们进入一种更深层面的思考。“立德、立功、立言”是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观念,也是儒家文化的最高要求。它作为中国历代士人精神维度传承不息的价值谱系,是种族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而三者统一之“内圣外王”思想则是曾国藩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导向。他的奋斗实践与理想抱负构成彼此验证的关系,因而在本质上奠定了《曾国藩》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厚重的文化意蕴。

小说中的主人公曾国藩作为以儒学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可谓封建末世传统文化的一个聚焦点。他全面而悲情地展示了历经两千余年积淀的封建文化在新的时代交替口的自我坚守、自我固执与艰难挣扎。曾国藩“站在19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的峰巅,把‘圣贤’或‘恶魔’等反差巨大的历史评价展露出来,让人们破译他这个‘人’及那一特定时代历史和文化的深层隐秘。”^[1]因此,相较于对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者更倾向于对人物本身及其行为举止背后的文化底蕴进行探寻。

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自成一体,刚毅强健,不眠不息。君子处世,理应如天,奋发向上,永不止步。有道是:“闻鸡起舞早耕耘,天道酬勤有志人。”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其一生可谓辛勤耕耘的一生,他奋发图

强,永不停息,而随着事业的节节高升,位极人臣的他依旧不变的是当初的刻苦与勤勉。名垂青史构成了曾国藩不懈奋斗的精神支点,成为他维系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复兴中华则是他对世代承袭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自我提升。

(一)自我期许与立功之梦

曾国藩虽出身农家,且家境并不富裕,但却有着很高的自我期许,他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即报效君王建功立业。道光十九年初冬,散馆进京的曾国藩在登岳阳楼游览之时,便“反复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干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业!”^[2]⁸这一年,曾国藩29岁。此后的几年间曾国藩连续7次升迁,37岁获得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至二品。在儒家入世思想的强力影响下,他的理想抱负愈见明晰,创一番张良、诸葛亮、李泌、张居正般的辉煌相业,成为他精神的支点与强劲动力。

母亲去世,回乡奔丧的曾国藩恰逢太平军横扫湘湖大地,“世无艰难,何来人杰”,这混乱动荡的局势暗藏历史的契机。太平军在长沙的激战引起了官员们的惊恐,而这份惊恐并没有随着太平军的撤离而有所缓解,左宗棠等人觉得只有在各地建团练,省里由一人统领,方有可能对抗太平军。这主办省团练的重任最后落在正在原籍守制的曾侍郎身上。之前的曾国藩“只看到吏治腐败、绿营腐朽的现象,弄得心灰意冷,却不曾想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想法去重新开创一个局面。如果下定决心来办好团练,也很有可能像当年戚继光创建戚家军那样,练就一支今日的曾家军。古人能做到

的事,今人为什么做不到呢?”^{[2]105}

然而,清政府只想维持地方治安,并不想让地方建立军队。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深谙官场之道的曾国藩更是明了于心。但是,如若不把团练当做军队来训练,那么其战斗能力则永远提不上去。好的军队当然要有好的将领,这是第一位的。身为文官的曾国藩在一开始深感自己在治军方面能力匮乏,一方面他不断加强学习,一方面求贤若渴、寻找将才。曾国藩认为:“至于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沮。”^{[3]5643}他选将有四个标准:“一曰才堪治民,一曰不畏死,一曰不急名利,一曰耐辛苦。”^{[4]1874}在招募士兵方面曾国藩亦有自己的一套,所招之兵以湘乡最多。他认为相同的地域环境与民风习俗,有助于军队内部的团结。

曾国藩治军严明,同时重勤操苦练:“每天五更三点放炮,闻炮即起,夜晚每营派十人巡逻;黎明演早操,营官、哨官必须亲自到场;午刻点名一次;日斜时演晚操,二更前点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本人亲到演武坪监督操练,并训话。从早到晚,每天演武坪尘土飞扬,喊杀声不绝,衡州城里的百姓都奇怪,这是哪来的一支人马,操练如此认真、勤勉?”^{[2]219}勤操苦练固然重要,但军队的思想教育亦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曾国藩十分注重训与练的结合。他曾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其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之也。”^{[4]1866}从“苦口滴杜鹃之血”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湘军身上倾注了多少精力与心血,他对湘军的训练与教育丝毫不亚于训练与教育子女。

然而,乱世之下须用重典。“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2]158}“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因着这一系列举措,曾国藩得了“曾剃头”的名号。但对于一个意志坚定,抱有莫大决心的他来说,纵使“车裂”亦是无所畏惧的。

初办团练,衡州练勇,曾国藩抓住机遇,呕心沥血,终于练就了一支在当时来说战斗力最强的军队。靖港惨败——攻取武昌——田镇大捷——江西受困——进军皖中——强围安庆——攻下金陵,在此

后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有过奇功也有过失败,有豪情满怀、感受胜利的时候,也有羞愧不已、跳河自杀的时候。困难的战争局面,强劲的对手,天子的防范,满臣的猜忌……几度心力交瘁甚至晕厥吐血的曾国藩依然坚挺着。他曾感慨道:“‘朱子之学得于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5]527}

祖祖辈辈与功名、官场无缘的曾国藩最终成就了一段不仅属于自己更属于历史的传奇:在与太平军的拼搏厮杀中屡立战功,后封一等毅勇侯;在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力挽狂澜、稳定局势。而成功的秘诀是有着很高自我期许的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坚持、一份勤奋,就如他自己所言:“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我辈当此危难乱世,要做英雄,舍劳苦之外没有捷径。”^{[6]244}

(二)历史使命与中兴之梦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能让一代政治名家兼史学大师有如此高评价的人,当然不只是一个仅仅执着于自我功业的人。身处乱世而能胸怀天下是贤者有别于能者的最大之处。作为儒学名士,建功立业只是成就自我的第一步,国家富强、民风淳朴才是最终的奋斗目标。

李鸿章曾评价曾国藩说:“恩师虽以理学名臣誉满朝野,但绝不是一个迂腐的理学先生。”^{[6]231}这一点,从他当初创办水师并最终将其改为经制之师,填补中国水军空白就可窥见一斑。他有极为敏锐的眼光,一系列举措往往具有前瞻性,这不仅出于一种对苦难的微妙的感应,从根本上来说源自其本身深重的历史责任感。曾国藩在任两江总督时,决心整顿两江的世吏风气,并“以两江作为基地,造成一个好风气,推广到全国,从而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做一个像周公、孔子那样的人,将整个国家治理为一个风俗醇厚、人心端正、四海升平、文明昌盛的社会”^{[6]21}。在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追求之时,曾国藩始终怀揣民族富强、国家强盛之心。这就是曾国藩对“中兴之梦”的朴素诠释与美好构想。

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在夹缝中创建了湘军这支由文人统率的强大军队,然而,在一开始,他的目的便绝不止于镇压太平天国。“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

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或可驱驰中原,渐望澄清。”^[4]¹⁸⁵⁶可见,曾国藩治军的目的是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当然,这个所谓的国家集中体现为满人为主的封建政权。

天津教案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刺激,“他心理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的委曲求全,是他的拼却名声,以顾大局,其实是整个朝廷,是整个中国的委曲求全,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丢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7]³⁸³曾国藩对封建王朝腐朽病变的肌体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仅仅依靠封建纲常来维护封建统治是行不通的,更别提民族自强。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极为推崇,于是,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推行洋务运动成为曾国藩自强之梦的开始。他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炮船制造基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7]⁴¹⁰

在曾国藩等人的艰辛努力下,国势衰微的清王朝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的迹象。但“将整个国家治理为一个风俗淳厚、人心端正、四海升平、文明昌盛的社会”,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来看曾国藩主动寻求的理想与现实是存在巨大差距的。所以,当建功立业的世俗理想实现之时,是“中兴之梦”的彻底破灭。

二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宽广,地势和顺,方能承载万物。君子处世,亦当如此,增厚美德,心怀天下。《朱子语类》载朱子曰:“试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为圣贤……”人可以助天地之化育,常人亦可以为圣贤,这是儒家所乐道的,亦是自古以来士人们的最高道德追求与精神动力。为人处世,当天人合一,增厚美德,方能承担伟业。作为誉满朝野的理学名士,“不为圣贤,则为禽兽”,是曾国藩从传统文化语境出发的最高道德追求。

(一) 静以修身

曾国藩一生官运亨通,37岁晋升侍郎衔,39岁

补礼部右侍郎实缺,至42岁奔母丧前,又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此后更是在与太平天国的转战中屡次立功。其仕途的顺畅和军事上的胜利是与他的人格魅力息息相关的,而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则主要源于一种自主而严格的人身修炼。儒家认为,修身乃人生第一要义,其所要求的“诚、敬、静、谨、恒”是曾国藩自修的主体方面,而一个“静”可谓打通了曾国藩漫长的修身之路。

曾国藩的人生信条之一:“君子多思不若养志,多言不若守静,多才不若蓄德”,备言立志高远、心静如水、厚增美德方为君子力行之法。以儒家思想作为观照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进行自我人格的铸造是曾国藩的修身指南。而相比儒家,道家则更加注重对静的阐发。《老君西升经》曰:“治身之道,先隐天地,静居万物之始。”《太上老君内观经》曰:“清静则生,浊躁则亡。”“心若清静,则万祸不生。”“人能常清静其心,则道自来居。”《道德经》亦有多处关于静的阐述,如:“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曾国藩的资质虽不属上乘,但他博采众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并具体运用到养身、治学、治军等各个方面,真正实现了“养其身”与“有作为”的深度结合。

修身第一要义当属养心,而养心第一步当属静心。如其养心名言所曰:“君子养心以静。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旁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动,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无事时,曾国藩常常行静坐之事,这在他的早年修身十三条的第一、二条里就有体现: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以求达到心如止水、心无旁骛的境界,这样才能头脑冷静,进而处理好各项事务。即使在行军打仗之余曾国藩亦不忘静坐,他曾自我总结:静以修身,宁静致远,养生养心,胜吃百药。

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与理学名臣,治学作文无疑是曾国藩极为看重的方面。而一个“静”字可谓曾国藩的治学要诀之一。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谈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曾国藩经常教导儿子曾纪泽要好好读书,唯有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读书纵然能提升人的品格,锤炼人的精神,但静下心来方能理解知识,得一己之体会。为文更要求静。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心境空明方可明察事物,于一种自在逍遥的状态中酝酿文思。心境安定,专一不杂,才能见识深远,学有所成。

《淮南子·兵略训》有言:“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疲则威可立也。”曾国藩在治军方面亦主张以静制动,静以胜动。他尝言:“须知千军万马,金鼓喧聒之中,未始非凝静致远、精思通神之地。”^{[8]88}“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9]345}在他看来,即使是行军打仗也只有静下来才能思考周密,而静并不意味着失去战机,相反,往往更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每到一处,曾国藩都要求士兵安营扎寨、修建壕墙,以养精蓄锐、自我保护、静观其变、应对敌军。此正如道家所谓“静为躁君”。“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因而,岳州之败,他批评曾国荃的吉字营“锐气有余,沉毅不足,气浮而不敛,兵家之所忌也。”^{[8]88}魏源《老子本义·论老子》曰:“黄老静观万物之变,而得其阖辟之枢。惟逆而忍之,静胜动,牝制牡,柔胜刚;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理学家吸取了道家的贵静学说,构建了主静的修身理论,却并未将之运用于治国治军方面。曾国藩以‘静’治军的思想,追根溯源,在儒家思想之外,主要还是来自于黄老道家,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战争中无非攻和守两方面,曾国藩的攻守战略中,都主张以静制动,后发制人。”^[10]曾国藩以静治军的方法,虽有其保守之处,但在与天平天国的实际作战中多次证明了其成功之处。

博采众长、取用各家的曾国藩以静养身,以静治学,以静治军,将一个“静”字有机地贯穿于实践活动,这是其独特之处也是其成功之处。

(二)俭以养德

“清贫如寒素,廉奉尽充官用,未尝置屋一廛,食不过食四簋。”^{[11]1037}无论是持身、治家、还是为官,曾国藩都厉行节俭,这与他农家子弟的出身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德层面的自主追求。他曾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12]1247}节俭对于曾国藩来说不仅是一种行之终生的生活作风,还是一种从传统价值体系出发的道德观。他坚信:“持身俭,则自立自尊;治家俭,则家

业兴隆;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

曾国藩的生活起居可谓俭朴至极,连前来考察的满人官员德音杭布都不得不大为叹服:“这便是前礼部侍郎、现二万湘勇统帅的居室!”“只见屋内除一张床、一张书案、两条木凳、三只大竹箱外,再无别物。床上只铺着一张半旧草席,草席上垒着一床蓝底印花棉被,被上放着一件打了三四个补丁的天青哈拉呢马甲。屋里唯一饰物,便是墙上挂的当年唐鉴所赠‘不做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2]338}这番景象纵使寻常百姓见了亦会不敢相信,何况惯于出入公侯王绅之家的德音杭布。在他看来:“虽是战争之中,但原巡抚衙门里一应器具都在,尽可搬来,也不须如此寒伧。”由此,德音杭布叹曰:“大人自奉也太俭朴了。”而曾国藩则不以为然地说:“学生出身寒素,多年节俭成习,况军旅之中,更不能铺张。”^{[2]338}在吃方面,曾国藩亦是简单至极,平日最喜家乡的腌菜。这与当时多数官员们的奢侈生活形成了极端的对比,而德音杭布的惊叹无疑凸显了曾国藩廉洁之风的可贵。

曾国藩在持家教子方面,常常强调去骄逸,尽孝悌;忌奢华,尚节俭。为教育家人,提倡俭朴的作风,曾国藩于大堂上亲笔题下:“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而其著名的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则更为具体朴素地诠释了他的治家方针。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所以他非常反对家中购私田、建新房。当得知夫人在娘家买田置地时,曾国藩立马令其转让出去。他曾于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对待子女,更是孜孜不倦,教导其戒骄奢、尚节朴。其制定的家规中便有“女子每月做鞋一双,腌菜一坛”。而堂堂一品官员的女儿出嫁,仍是沿袭旧例——二百两银子的嫁妆。

封建末世,官场腐败,贪污成风,骄奢成灾,曾国藩对此深感痛心,虽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扭转这积重难返的局面,但内在操守与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坚持做到独善其身,绝不同流合污。整顿两江吏治时,曾国藩“亲自作劝诫浅语十六条。其中劝诫州县四条,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治署内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俭朴以养德。劝诫营官四条,上而将领,下而哨弁以此类推: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劝诫委员四条,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习勤劳以尽职,崇俭约以养廉,勤学问

以广才,戒骄惰以正俗。劝诫绅士四条,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保愚懦以庇乡,崇俭让以奉公,禁大言以务实,扩才识以待用。”^{[6]219}不难看出,劝诫浅语十六条以崇俭为中心,实为曾国藩针对当时吏治弊病提出的主治方针。

曾国藩曾于书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13]16}在个人、家庭、官场,曾国藩都恪守“勤廉”二字,并行之终身,实属难得。

“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是充分的自我完善与自性实现。”^{[14]63}自我主要表现为意识的中心,而自性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统一。自性的实现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事业,在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潜意识的综合作用下,曾国藩将这项事业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厚德”二字当之无愧。

三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唐浩明塑造的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如果从世俗层面上来说,这位封建末世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则更多地体现为与时代错位的悲剧。他的执着与坚守,追求与奋斗,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激起震耳的涛声,但细细一听,激荡的表面下是一首深沉而低鸣的挽歌,但纵然是挽歌,在哀婉之余亦带着巨浪般的悲壮。

(一) 坚守在错位时代的情感张力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展示的曾国藩的一生可谓以道德为纲的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不图享乐、政治严明、心忧国家。古人言:“心底无私天地宽。”居家,他是关心子女、孜孜不倦的好父亲;治学,他是名满京城的儒学大家、理学名士;为人,他宽厚有礼、与人为善;治军,他恩威并重、善于沟通;为官,他公正严明、软硬兼施。

曾国藩有其远大的政治理想:“做一个像周公、孔子那样的人,将整个国家治理为一个风俗醇厚、人心端正、四海升平、文明昌盛的社会。”^{[2]219}这是曾国藩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守的集中体现,但在封建文化崩溃的大背景下这种近似固执的坚守带着一种决绝。因为其远大理想与所处时代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只会在曾国藩杰出才能的映衬下激起一股独特的情感张力,隐透着令人窒息的个人与时代交织的悲哀。而其一系列有悖历史潮流的举措无疑在强化了时代的悲剧之余为其个人的悲剧做出了最直接的解释。

“恩师虽以理学名臣誉满朝野,但决不是一个

迂腐的理学先生。”^{[6]231}他“既深谙历代权臣的用人之术,又有一套自己识别、考察、培育、驾驭、笼络人才的办法。”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最大的才能,这为他以后的战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231}。在《应诏陈言疏》中曾国藩主张:“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当然,对于为官之道曾国藩无疑是十分精通的,他对官场上的各种套数驾轻就熟。什么时候该溜须拍马,什么时候须用重典,什么时候当威逼利诱,什么时候要恩威并重,可谓技艺纯熟。治理国家,他亦有自己的想法与主张,在《应诏陈言疏》中他举出了一系列治理之法,“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民生以穡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涉及吏治、选材、物资、兵力等各个方面。对于外国势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曾国藩有其自己独特的想法与对策。一方面他忍辱负重,避免与西方人正面冲突,维持表面的和睦,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暂时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他对西方人侵略中国的种种行径十分痛恨,甚至以借助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天国为耻,并决心引用西方先进技术将其驱逐出境。

然而,一切行为举止皆以传统道德规范为基准的他是无法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的。纵使在黑暗污浊的体制中如鱼得水亦不能丝毫动摇其腐朽但依然稳固的根基;纵使身为千军统帅,封疆大吏亦无法整治一地之风气,以求推广全国,实现大清中兴。

曾国藩生活在一个行将就木、千疮百孔的封建末世王朝,而他毕生梦想却是重振周孔伟业,从这一点来说,他无疑是站在了历史的背面,正如作者所言:“曾国藩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不同于岳飞、韩信,他不是怀才不遇,才未尽用,或大才小用,他有大才,也得到发挥。他的悲剧表现在他自己理想与他所处时代的矛盾上。”^[15]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走向失败,从此层面来说,曾国藩扮演的是一位悲剧性的历史角色。坚定的信仰、艰辛的付出、杰出的才能构成了曾国藩悲剧性格的深刻内涵,让这出历史悲剧蒙上一层引人反思、惹人悲叹的情感色彩。

高蹈的理想与谦卑的情怀,生命的苦难与意志

的顽强,终生的遗憾与外在的辉煌……在时代语境与个体追求的彼此纠葛中迸发出一股深沉的根植历史文本而游离历史本身之外的情感流,在这种情感张力中,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将一位世纪末名臣的赤子之情与人生之悲彰显无遗。然而,人物性格的深刻内涵在历史观照所得出的悲剧色彩之余又隐透着一股非历时性的宗教式的神圣与高洁。

(二)封建文化的深沉挽歌

唐浩明说:“作为小说的作者,我慢慢揣摩出,他个性中的两重性,一边较多地来源于他的资质,另一边较多地来源于他的修养。这两个侧边,有时一个侧边占了上风,有时另一个侧边占了上风,它们共同组成曾国藩的性格。”“从我的研究分析来看,曾国藩这个人的资质算不上超等,他的天赋并不卓异。”“但是曾国藩的修养却是超等的。”^[15]而就是这种超等的修养,在曾国藩身上深深地体现出一种不自由,这种不自由无疑出自他对儒家文化的恪守,对自我人格近似苛刻式的培养。显然,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侧重文化的角度。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曾国藩在走向失败的同时,也勾勒出了其身后的封建文化体系全面崩溃的轨迹,在个人命运的悲鸣中演奏了一首封建文化的深沉挽歌。唐浩明将人物置身于内忧外患、矛盾激化的封建末世王朝,艺术地处理了人物塑造问题与文化视角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心理之间隐而不显的纽带就是积淀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

“立德、立功、立言”即今人所谓做人、做事、做文章,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的最高要求,三者统一也就是“内圣外王”。主人公创周孔伟业、专诚治学等一系列按照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与要求的行为,从本质上奠定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文本的文化意蕴。而当人物行为在承接了文化整体的内在精神之时无意之中为文本内在结构与意蕴增添了某种难以察觉的反讽性质。

这种反讽性质首先体现为物自我个性的慢性扼杀。荣格心理学认为,如果一个人过分地热衷和沉湎于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把自己人性仅认同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从《曾国藩》中,虽然读者更多地是体会到曾国藩处变不惊的气度与喜怒不形于色的情感节制,如虽身陷困境但泰然自若,指挥三军威严之极,但这背后是百般的压抑。由于春燕之死而带来的悲痛,为一块御赐牌匾而让兄长永诀凡尘等一系列做法却极大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与纠葛,不仅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他的苦、他的累,更折射出中国传统

文化扼杀个人情感的粗暴的一面,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亦是历代中国士人悲哀之所在。权力滔天的他在面见皇上、皇太后时还是会紧张流汗,这无疑又彰显了封建文化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君臣观念,他权位再高也无法改变这背负千年的伦理道德负担。

当然,这种反讽性质更深地体现在主人公理想举措的实际效果与时代的矛盾交织上。在封建时代,立德不过是做帝王的忠实臣民;立功无非是了却君王天下之事;立言无外乎宣扬纲常伦理。而这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之精髓成为古今多少仁人志士一生的理想与追求。但历史证明,可达之人凤毛麟角,其非同一般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挑战人性)使得历代士多少子扼腕痛惜、饮恨终身。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就是封建时代最典型、最悲情的士子形象的代表。他在遗嘱中说到:“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而事实上曾国藩功德最盛,位极人臣,威吓四方。但德化天下、移风易俗的社会治理理念没有实现,对于儒家信徒、执着于文明社会建设的曾国藩又怎会不含恨而终呢?如果说这种讽刺尚有其难以言说的正面意义的话,那么为了政治目的不惜动用一些阴谋手段,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又是否站在了道德的背面,给予封建传统文化最致命最可笑的回击呢?这正如作者唐浩明所说,一向以道德为纲的曾国藩在维护封建统治、成就个人目的时所表现出的两面性,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两重性。

当大家都以“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劝曾国藩夺位时,曾国藩便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答之。有人说此句表明了曾国藩虽有境界高远、淡泊功名的一面,但终是君子小义而没有“为天下苍生当仁不让,大义灭亲”的圣贤王道。这种评价虽不甚妥当,实乃一家之言,但却暴露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致命缺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限制了人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封建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反动的,而在其精神滋养下的大众最终也只能将一生的最高目标与人生的终极追求锁定在维护其统治上,否则,在这种特定的权威的价值评判体系中他将难以立足,其“备受洗礼”的灵魂亦将在非价值认同的语境下挣扎受难。更可悲的是,其本人对自己的痛苦与困境是不自知的,因为自由而健康的人生价值目标是可能会被冠以“乱流”甚至“逆贼”之名的,而这往往又是封建传统文化哺育下的士人所

无法承担的生命之重罪。

相对于某些历史小说对人物悲剧、时代悲剧、民族悲剧的倾情诠释与深度解剖,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使我们看到行进了两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深重的内在矛盾和疲老的形象。它需要变革、超拔或涅槃再生。而曾国藩绝不可能有承担这种重任壮举的幸运。”^[1]随着时代环境的根本性转变,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作为支撑。而作为封建文化最后一个完整的代表,曾国藩只能用自己悲壮而悲情的一生奏响了一曲在时代的天空久久低鸣的挽歌。

《曾国藩》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但作者是从文化角度来完成对曾国藩这个颇具争议的历史形象的精妙塑造的。“在一切重大问题的举措中,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圣贤与禽兽的搏战。他最仁义也最残忍,最坦诚也最虚伪,最刚烈也最怯懦,最腐朽也最开放。作品正是从文化的视角涵盖、化合政治、阶级与道德的冲突,令人信服地把人物个性之中的两个极致熔铸于一炉。力图超越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审美认知模式,从而再现了曾国藩的本真形态。”^[1]小说中的曾国藩既不是救世之主,亦不是乱世之妖,只是一个对自我与社会有着双重固执的人。这位“已被常人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忧伤恐惧、委屈打击、苦心思虑,打磨得两鬓如霜,两颊如削”^{[7]237}的历史老人是否会让你暂时忘却他的功名与得失,唤起内心深处最温柔的怜惜?身体的疲弱好似“经不起轿窗外扬起的风沙”,但精神国度的追问又是否经得起以青春与理想为代价的历史的评判?“这十七年间的腥风血雨,究竟靠什么挺过来了呢?是靠青年时代立下的雄心壮志?靠镜海师所传授的理学修养?还是靠对三朝皇恩的报答之心?这十七年来所做的一切,究竟又是图的什么呢?为名标青史、流芳百世?为维护名教、拯民水火?还是为了眼前这座京城,以及住在这里大大小小的官吏和他们的主子?”^{[7]237}此时的曾国藩仿佛在一瞬间模糊了自己的位置,忘却了团聚心头的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他的反思揭示着一些惊人的东西,这些东西足以撼动整个封建文化背景下所有士子们的入世之心以及种种不须怀疑的

理应如此。作为封建文化集大成者的他在对封建社会价值维系的自我反问与深度思索中,暴露了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精神危机与情感空白,这不知是文化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曙光?但无疑完成了作者对曾国藩的最终塑造——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一出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而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又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出一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参考文献:

- [1] 李树声. 几度哀歌向天问:评《曾国藩》[J]. 当代作家评论,1995(1):61-67.
- [2] 唐浩明. 曾国藩:上[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 [3]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第7卷[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4]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第3卷[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 [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91.
- [6] 唐浩明. 曾国藩:中[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 [7] 唐浩明. 曾国藩:下[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 [8]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批牍[M]. 长沙:岳麓书社,1994.
- [9]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M]. 长沙:岳麓书社,1994.
- [10] 彭 昊. 论曾国藩以“静”治军[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3):115-118.
- [11]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中[M]. 北京:中国书店,1979.
- [1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社,1991.
- [13]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第7册[M]. 北京:中国书店,2011.
- [14] C. S. 霍尔, V. J. 诺贝德. 荣格心理学入门[M]. 冯 川, 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15] 唐浩明. 《曾国藩》创作琐谈[J]. 文学评论,1993(6):119-131.

责任编辑:黄声波